



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

促进社会道德共识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黄勇



黄勇，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应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主编，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出版中英文专著10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各百余篇。

随着道德心理学与伦理学领域关于“同感”(Empathy)现象的讨论日益深入，我们把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哲学。研究发现，中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万物一体”思想正是对“同感”概念极具深度的哲学阐释，不仅“一体”概念的提出时间早于西方哲学，更蕴含着能够矫正当代道德心理学相关理论探讨有失偏颇的独特智慧。

什么是同感？在西方哲学史上，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常被视作系统讨论“同感”的先驱，当时，“同感”在英语中多用sympathy（同情）表述。西方哲学认为，同感现象就是代替他人的情感，即我的感觉和我同感对象的感觉是相同的；如果他人受伤只有他自己能感觉到，这不是同感，而是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产生的同情。同感现象是多层面的：认知层面，知道他人痛苦；感知层面，不光知道他人痛苦，而且也感到了他人的痛苦；动力层面，感到他人的痛苦并产生一种动机或者动力，且要把这种痛苦解除掉。这三个层面是同感现象的特征，跟认知不一样，认知是我知道他人很痛苦，不一定有能力解除他人的痛苦，但是有同感的人，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代道德心理学对

2025年7月26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堂第四期”在贵阳孔学堂开讲。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应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知名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以“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为题，为我们解读阳明心学的智慧如何跨越五百年时空，成为连接个体良知与人类命运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重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价值。本报特将讲座内容进行摘录发表，以飨读者。

同感现象会产生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争论的主要原因。

中国哲学很早就有关于“同感”的探索，似于中国古代先哲所探讨的“万物一体”观念。先秦典籍《庄子》和《孟子》都有关于“万物一体”的讨论，北宋理学家程颐明确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核心理念，明代中期的王阳明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理念，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者也”，强调修养高的“大人”能够体察万物，视天地万物如同自己的身体器官。程颐以“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为譬喻，精辟阐释了“仁”的本质等同于“能感痛痒”。“最善名状”最能说明儒家讲的“仁”不仅指感知自身之痛痒，更指能感同身受他人乃至鸟兽草木之痛痒。王阳明进一步以“孺子将入于井”引发的“休惕恻隐之心”为例，证明因“仁”而使自我与孺子合为一体，所以孺子入井便如同自身面临险境一样。同样，对“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的“不忍之心”就是一种“同感”，从孺子到人、鸟兽甚至草木瓦石，莫不如此。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当代道德心理学定义的“同感”高度契合，但意义远超“同感”范围。除了认知层面、感知层面、动力层面，还包括对草木有怜悯之心，对瓦石有顾惜之心。尤为重要的是，“万物一体”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讨论常陷入的“同感源于利己抑或利他”的二元困境。如果“己”和“他”是一体，利己利他之分便失去了存在根基，利己即自利，自利即利他，这为解决西方伦理学在此问题上的长期争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可以矫正“同感”对象的狭隘性。西方哲学认为，从认知、感受、动力三个层面来看，对恶人的同感几乎是

不可能的。甚至，从道德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同感现象不应该有。一是因为对恶人同感，一起做恶事不好；二是同感很难产生，除非自身就是恶人。有的学者则认为，除了道德心理学讨论的身体上的痛苦(Physical Pain)，还有一种社会性的痛苦(Social Pain)，即人的社会性疼痛。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为“同感”概念提供了深刻阐述，更能有效矫正和拓展当代道德心理学对同感现象的某些理解局限。当代道德心理学主要关注生理痛苦或社会痛苦，如创伤和羞辱。而王阳明则揭示更深刻的同感对象，道德主体因良知遮蔽而生的“心体之痛”。王阳明提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其忧心在于有“未亲”“未义”“未别”“未序”“未信”者，即那些因私欲障蔽而未能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缺乏“仁”的人。圣人对此类“心体之痛”亦能感同身受，并生发出需要“教养之”以“克其私，去其蔽”的动力，助其“复其心体之同然”，恢复本有的仁心，达至一体境界。这种同感聚焦于道德良心之苦，超越了仅仅关注生理或社会感受的维度，将道德完善本身纳入了同感的对象领域。

阐释“同感”本质的深度性。有关对于道德缺失者应如何表达同理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对方并未意识到自身痛苦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万物一体”思想为此提供了类比解释。如同医生面对尚未知悉病情的重症患者，虽患者此刻未觉痛苦，但医生基于其应然状态和病理之“苦”，已感同身受其未来必然之痛。同理，对道德缺失者的同感，源于“仁者”能感知其心体偏离本然之善的“应然之痛”，若其良知觉醒，必然对此痛有同感。这种同感并非认同其恶行，而是对道德蒙蔽状态的深切忧虑以及对向善可能性的期许，以此激发和帮助他去除蔽障、复归本心

的动力。

奠立同感基础的普遍性。“万物一体”思想强调“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肯定了同感能力的普遍性基础，并将其视为道德修养达到“大人”条件的自然体现。这既为理解为何普通人常能对亲友甚至陌生人产生生理痛苦的同感提供了依据，也为解释为何需要对道德缺失者产生同感指明了方向——唤醒其共有的心体之仁。同时，王阳明承认圣人亦可能有“小过”，这使得“仁者”能够凭借自身对道德瑕疵的体验，推己及人地对他人的心体之痛产生理解与共鸣。

中国智慧的时代价值。以程颐、王阳明为代表的“万物一体”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对“同感”现象的理解，不仅展现了先贤卓越的哲学洞见，而且早于西方相关讨论，更以其超越主客对立的整体观照、对道德心体之痛的深度体认，以及基于普遍人性仁心的修养论，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同感的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矫正、启迪与拓展。在强调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深入挖掘并阐释“万物一体”思想所蕴含的深刻伦理智慧和心理学洞见，对于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道德理论，促进社会道德共识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一思想彰显了中国哲学在理解人类复杂道德心理方面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讲座现场。
覃伟 摄

阳明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与运用

张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王阳明的学说和主张，充分肯定阳明心学的历史和时代价值，指出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近年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包括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在内的“四大文化工程”，深入挖掘阳明心学的思想文化内涵、当代价值并力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新方法，取得了一些新经验。

从顶层设计上持续发掘阳明文化的时代价值。省级层面系统谋划一系列务实举措，擦亮贵州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的文化名片。研究印发《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实施方案》，去虚写实明确阳明文化转化运用9个方面28项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任务图责任人，力求通过若干努力，为贵州留下一批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阳明文化建设成果。谋划实施《阳明文库》重大文化出版工程，汇聚和推出海内外阳明文化精品力作，有关图书被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国新闻出版报》刊文评价其出版“意义深远，是中国心学史上的里程碑”。在央视纪录频道推出优质纪录片《阳明悟道》，追溯王阳明从浙江启程到贵州龙场的思想蜕变历程。策划传播产品，意见领袖流量大V有效提升阳明文化关注度。建成国内首个省级“心学”专题新型特色智库——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加强阳明孔学建设，依托其平台，推出“共产党人的‘心学’研习基地”“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等项目，将阳明心学融入干部培训与企业文化建设中；持续推动孔学堂书局与岳麓书院等知名科研机构

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阳明文化与地方文化交流互动。《贵阳学院学报》阳明学论文发表总量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名列第一名，成为贵州乃至全国阳明学论文的重要发表平台。

深厚的阳明文化积淀，正催生出一股由多主体推动的转化运用热潮。贵州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具有丰富的阳明文化资源。精心编制阳明文化研究选题规划并整合一流学术资源领衔指导研究。聘请一流学者担任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提供学术指导并领衔开展重点课题研究。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一书在北京首发并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报道。省内科研机构对阳明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进入新时代以来，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等高校，开拓了阳明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新成绩。早在20世纪90年代，贵州师范大学就形成了以吴雁南教授为代表的阳明学研究团队。2002年，张新民教授筹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下设阳明学研究所等机构，2004年正式出版《阳明学刊》，成为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2014年，贵州师范大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课题。2017年，贵州师范大学组建“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团队，建立了“阳明学与黔学研究”中心，把阳明文化与地方文化

(作者为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阳明心学由此昌明、影响世界。可以说，五百年前的“龙场之悟”深刻塑造了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工夫论体系，“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知行合一”揭示了“理”不在心外，无需外求；“物”亦在“心”之范畴，无需外寻。因此，“格物”与“致知”便成为一事，不过皆是“正心”。而“正心”就是将格物工夫全然转化为“只是在心上做”，专注于“正念头”的修养功夫，使“心”始终与“理”贴合为一。要求“心”即是“理”，且是能活动的理，要随时知是知非、知善知恶，随时做道德判断，随时有正念、纠错的行动。笔者认为，王阳明所论“正心”即是格物，即是“致知”，亦即是“知行合一”。这便意味着，“知行合一”既揭示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性，也蕴含了改造主观世界与认识客观世界的内在张力。

王阳明所阐发的“心”，是具有大义的宏阔之心，它涵容天地万物，为世间万物赋予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在王阳明看来，心本至大至明，能够容纳万有、应接万事万物。在此意义上，“心”即“理”，即“天道”。而容物、应事就是“行”，这里的“即”字，意指“知”与“行”发端到完成，本就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正如王阳明所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厌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的真意所在。此段话清晰阐明了“知”与“行”的关系，就像“见好色”与“好好色”之间关系，二者是同一瞬间发生、同时存在。就这一点来说，“知行合一”正是王阳明汲取邵雍易学所提倡的心具万理、心含万物等观念后，在其自身心学体系中进行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

王阳明的知行观不仅指向个人品德修养的“成德”诉求，更蕴含着经世致用的“成物”理想。王阳明在体悟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理一物”不二，即“理一气”不二的基础上，确立了“吾心自足”与

主持人语

任健（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2300多年前，伟大的哲学家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尽心上》也言“万物皆备于我”，这可以说是“万物一体”理论的最早源头，宋明诸儒对此多有发明，王阳明吸取先儒智慧，形成了“万物一体”理论。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同感”概念有诸多契合并能为当代道德心理学提供理论贡献。那么，究竟有哪些贡献和如何贡献？黄勇教授以其深厚的哲学素养与心理学学养，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智慧，特别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同感”概念，深入剖析其对当代道德心理学建构的深刻启示与独特价值。

黄勇教授引经据典，将西方心理学的“同感”（Empathy）概念置于孟子“恻隐之心”、程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思想脉络中加以审视，通过精妙的跨文化哲思与对话，深刻洞悉了“同感”的内在结构，从认知、感知和动力三个层面和体察心境、情感共振、行为驱动等方面层层解析了现代道德心理学的理论框架。黄教授再通过“孺子入井”之不忍、“鸟兽哀鸣”之悲悯、“草木摧折”之顾惜、“瓦石毁坏”之恤心等经典意象，鲜活呈现了王阳明“万物一体”思想所蕴含的“同感”精髓，并详细分析了王阳明“一体”“同感”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可提供的理论资源。

黄教授以心理学、西方哲学、中国国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等多学科学术视野对“同感”做了创造性阐释。其交叉学科的诠释和研究方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学习和研究之门，特别是将阳明心学的智慧引入当代道德心理学领域，为探究道德修养的深层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范式；同时，黄教授对王阳明“心上磨”和“事上练”道德修养路径的分析，为个体德性涵育与道德建设提供了践行方案。